

中外经济专家论坛

制度、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张军 著


ZHIDU ZUZHI YU ZHONGGUO DE JINGJI GAIGE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制度、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 张 军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张军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5

(中外经济专家论坛)

ISBN 7-81098-110-2/F·103

I. 制… II. 张 III. 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383 号

责任编辑 王联合

封面设计 周卫民

ZHIDU ZUZHI YU ZHONGGUO DE JINGJI GAIGE
制度、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张军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装订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90mm×1240mm 1/32 13.75 印张(插页:2) 285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1.00 元

前 言

我很早就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系列“中外经济专家论坛”做出过承诺,愿意以自己这些年来单独或者与哈勒根教授(华盛顿州立大学)以及我的几位学生多年来合作发表的一些与转型经济有关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一本转型经济学的书。但是,一方面忙于自己的其他工作,另一方面,在这个所谓“全国人民都很忙”的急速变化时期,坐下来整理过去的研究工作,似乎并没有多少激情。

终于有一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也许由学生来替代我做这样一个工作会更有意义吧。很有天分的罗长远是由我指导论文的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候选人。一年来,他和我在微观经济学及应用工业组织理论于中国经济转轨方面合作蛮多。而且我发现他对中国的转型理论有一种难得的好奇心。事实证明,由他来搜寻和选编我过去 10 年来零碎发表的以转型为主要论题的论文,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我都是一个有趣和有益的活动。坦率地说,我自己很久没有关注过我 10 年前写的那些论文了,尤其对是那些发表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期我“初出茅庐”时的文章,我已有了陌生感。

我相信罗长远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寻找那些文章。那是



一项劳动密集的工作。当他寻找到了我的绝大多数文章之后，便跑到我的办公室激动地说，看了我早期写的那些文章觉得非常过瘾。他说，尽管现在的更年轻的经济学家可以写出更精致的论文，但好像再也没有我们那一代人的文章所具有的使命感了。这话显然是有些夸张的，但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改革开放后在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当代中国经济学转型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今天似乎越来越清晰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刻意地去追求，可是，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的工作确是多了一些历史的责任。不过，这更多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那个转型时代造就的。那个刚刚走向开放的时代给予了他们做出贡献的机会和做出贡献的方式。这也许是今天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不太能够理解和几乎无法整体超越的主要障碍。

但即使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的现代化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融入主流”的持续努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经验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迅速成长和步入世界学术舞台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把握好这个机遇是至关重要的。反过来说，中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的确也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才会越来越多地安心中国，回到中国，留在中国和立足中国，因为在中国，每天都发生着挑战我们的思想和现成理论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化。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发生在中国的这样的历史机遇已经并正在吸引着那些最聪明的学生们。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和以中国经验构筑的舞台，改革开放 25 年后我们终于有了一批批崇尚思想自由、追求学术卓越的一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活跃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前沿的领域。他们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聪明的头脑的一部分。而这个结果显然是在改

变着我们长期以来最聪明的人去搞自然科学的智商分布的结构。

我在一篇题为“聪明起来的经济学”的文章中写道：“回想25年前，当中国经济刚刚开始农业体制变革的时候，是一组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的脑袋依照他们几乎超前的眼光，业余地使用现代的经济理念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尽管非常粗糙）帮助政府获取了经过统计处理和理论分析的调查数据，不仅在当时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而且为那时还不为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树立了学习的楷模。在这个团队对农业体制变革和农业发展的研究正在深入的时候，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战略如何进行等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初期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大的问题吸引着大的智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绝对是那些最聪明的人加入了那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尤其是1985年那场所谓‘价格双轨制’的著名争论中。”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在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完成学业后出国留学，进入欧美著名高等学府深造。尽管读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数绝对领先，但选择经济学或从自然科学与工程学转读经济学的学生数量不断增长。这个现象同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变革所具有的挑战意义当然是正相关的。选择攻读经济学的学生渴望获得经济学的智力装备能够使自己变成中国经济变革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事实几乎是，变成当事人的最具代表性的角色就是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但你需要的是绝对聪明的脑袋：当话语触到了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人就站到思想与学术的最前锋。

眼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体制上的挑战。一个基本

的共识就是，金融改革和法律转型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金融和法律部门的转型是一个绝对复杂的工作，它需要聪明绝伦的脑袋。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因为聪明而选择了金融学和法学，而今天选择在中国亲身参与推动金融和法律体制的变革，更是聪明。当然，因为经济体制的变革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没有可以直接拷贝的模式，它需要诱导，也需要推动，更需要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诸领域互动。所以，最聪明的脑袋也代替不了这一切。但是，有了聪明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干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这么干。

只是，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经济学家，他可以是提出重大理论问题的人，他也可以是对中国问题做开创性研究工作的人，他还可以是开展研究项目的领导者和协调人。无论什么性质的工作，它们合在一起就是在为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现代化做出贡献。好在，自己的路还很长。

张军

2003年岁末记于沪上



目 录

前言/1

1 中国的计划经济/1

- 1-1 信息费用、有限理性与计划约简
——关于中国传统计划结构的一个理论解说/1
- 1-2 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
——兼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决定论/21
- 1-3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41

2 企业改革/59

- 2-1 关于企业制度的理论模式/59
- 2-2 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
——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个假说/74
- 2-3 社会主义企业的货币激励与产权结构:中国案例/92
- 2-4 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110

3 转轨经济的工业组织和市场结构/128

- 3-1 转轨经济中的“过渡进入”问题

- 对“重复建设”的经济学分析/128
- 3-2 市场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143
- 3-3 所有制、厂商规模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的决定：
解释及其政策含义/164

- 4 农村工业化/196**
 - 4-1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196
 - 4-2 中国乡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技术选择
及地区差异(1979~2000年)
——透视乡镇企业发展的成绩、现状和未来的
前景/215
 - 4-3 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249
 - 4-4 农村金融与乡镇企业民营化：一个文献综述/275
 - 4-5 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290
 - 4-6 改革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
研究/304

- 5 过渡经济学/321**
 - 5-1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与争论/321
 - 5-2 过渡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338
 - 5-3 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363
 - 5-4 改革起点和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382
 - 5-5 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395
 - 5-6 中国的渐进改革为什么能成功/407

- 后记/425

中国的计划经济

1-1 信息费用、有限理性与计划约简 ——关于中国传统计划结构的一个理论解说*

1-1-1 引言

过去的 40 年,由于许多基本假定得以修改而推动了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其中两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

(1)信息不再是可以假定为免费物品。获得信息是有代价的,甚至有时候在许多情况下放弃信息的搜寻是明智和经济的。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使得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决策者来说,用于决策的信息都不再达到完全充分的程度,在决策上追求十

* 发表于《经济发展研究》1992 年第 3 期。



全十美是不经济的行为。

(2)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无论什么样的决策者,其知识、经验和受教育的程度都是不完全的,对信息的接受能力、分析处理能力以及对合理行为的计算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先知先觉和料事如神的人不是现实的人。

以上两个命题对中央计划机关或计划者来讲同样成立。不仅完全的中央集中计划所需的信息条件不可能满足,而且中央计划者处理信息和对合理行为的计算能力也极其有限。就是说,计划者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如下假设: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结构的形成是对信息费用和计划者有限理性的反应结果。本文进一步将这个反应的过程分解为中央集中计划的不断“约简”过程,在同时起作用的各种条件下,约简的结果形成了计划的多级结构和多元的计划者主体。

不过,对于本文着重考察的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来讲,计划的约简采取了一种既合理又偶然的方式。这体现在计划的区域约简是按已有的行政区划进行的,部门约简形成了中央行政主管机构。其结果不仅形成了等级同构的计划管理体制,而且在计划约简中实际界定了中央与地方各行政层次在国有财产(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上的产权范围,从此使中国经济的计划陷入了各级政府主持以及“条块”相互作用或博弈的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事实上,十多年前开始的全面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出现的困惑或问题无不与之相关。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以后专门讨论。本文只是力图就中国建国后30年所形成的特殊的计划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给出一个理论上的解说,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实证检验。

1-1-2 信息费用与有限理性

寻求在经典作家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古典环境”内的大量假定(明显的和稳含的)是我们研究传统中央计划型经济与古典模式偏离的最好出发点。但考虑到理论研究只需要(也应该需要)极少假定条件的“节制原则”,我们这里的讨论也就仅集中于最关键也是最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上。你可以罗列出的一系列不同于他人罗列的大量假定条件,但我认为都必须有这么两个假定才能真正体现古典模式的最基本前提,一是信息费用为零,二是中央计划者具有无限的理性。信息费用为零也就是说信息是一种可以免费赠送的礼品,搜寻信息是无代价的,所以任何私人隐匿的信息也将完全为计划者所知,这就足以保证中央计划当局获得关于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劳动力品质、资本存量、社会资源的约束和生产可能性,消费者的偏好及其需求数量等等完全充分的信息。然而,如此完备的信息即使唾手可得,但要使有效地、合理地、及时地处理和集中上亿万计的信息维数并计算出合理选择的结果成为可能,就只能求助于计划者的无限能力或无限理性这个隐含假设了。所以,很显然,在古典模式里与信息费用为零假设共存的必然还有一个关于计划者具有无限理性的假设。简单地说,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流量,中央计划当局被假定具有可以无限扩大的认识能力、处理能力和计算能力。

当然,这后一假定的严重脆弱性并不亚于信息完全或信息费用为零的假定。信息并非免费物品,为了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必须付出搜寻的代价,为了保证信息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支出大量的额外的资源代价。计划者的理性也不是无限的。中央计划当局也是由担负计划职能的机构及其在机构中从事计划

工作的人员构成的。有限的理性不仅适用于普通的人,也完全适用于计划人员。他们或许在工作中总是企图发挥充分的智力,但他们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计算能力总是有限的,他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合理的理智与有限的理性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这就是说,他们在处理和计算信息的能力与品质方面受到相当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确定性也存在于单个人身上。既然如此,计划当局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计算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取决于单个计划人的有限理性了。

里查德·朱迪(R. Judy, 1967)在“信息、控制与苏联经济管理”一文中谈到前苏联计划当局对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时说到:“经济中的信息数量的增加大约是生产量增加的平方(有时是立方),……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计划和管理领域。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所长弗·姆·格鲁希科夫的计算,为了保持现行的经济计划和管理体制,到1980年止,将需要雇用全国在这些活动中的全部成年人……”^①

那么,这个理性上的限制能否用电子计算机加以完全克服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曾一度成为纯粹的中央集中计划模式的一个中心假说。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超出了本文的主题,但是就涉及用电子计算机可否克服计划者有限理性的问题,提一下纽伯格(E. Neuberger, 1976)的评论就足够了。纽伯格在谈到“电子计算机乌托邦”时写道:“电子计算机乌托邦的实际障碍来源于整理和组织数据的困难,即难于设计一种经济模式,发展一套能够管理这样复杂的模式的数学计算系统,建立适合

^① [美]埃·纽伯格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2页。

于中央和企业传输信息的语言,并且取得输入这个模式的准确的有关未来的信息。根据现有的知识状况,希望设计出一种非常详细的并且能非常准确地反映一切相互作用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空想。对一切有关的变数、一切参数的价值和无数决策的函数关系缺乏完全的知识,模式开始设计的时间和模式投入使用的时间存在着差距,这一切都说明模式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外,只有在一切必要的参数可以被衡量,被编织成程序和受到控制的领域,这种模式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因此,诸如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的应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电子计算机乌托邦模式中很难得到解决。”^①

1-1-3 计划的约简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多级控制结构之所以出现,基本的原因是上一级提到的古典模式中的两个最根本的假定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信息不是免费的物品,获得信息是要付出资源代价的。对于有些信息,搜寻费用可能会高到禁止性水平之上,使得计划当局放弃信息的搜寻。例如,并于消费者偏好及其对物品的需求变化,关于产品质量和劳动者品性等的信息搜寻成本可能足以阻止计划当局的搜寻意愿,要由计划当局获得这类信息在现有的资源约束下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资源许可之内可以获得的信息来说,由于要汇总到中央计划当局的这类可得到信息的流量依然可能超出计划者的有限理性所能应付的最大值。例如,前苏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要进行计划,一个企业中包含的数据就达 1.3 万种到 4 万种,一年就至少要完成

^① [美]埃·纽伯格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90 页。



600 万次运算。上级要了解一个企业的大概情况,起码需要 4 400 个信息,虽然这还只是全部信息量的 12% 到 15%。^① 更何况,那个时候前苏联大约有 4.6 万个工业企业,6.6 万个交通企业,1.1 万个建筑和设计企业,5 万个农业企业,60 万个零售点,16.3 万个公共饮食店,17.5 万个仓库及货栈^②。1980 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大约是 8.3 万个,集中企业(包括农村生产队)大约有 700 万个^③。对于任何一个中央计划当局,如此庞大的信息流量对于有限的理性都是一个致命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计划当局需要对此做出反应。首先要做出的反应是在计划者面临的各种约束和满足中央政府偏好的范围内将计划最大限度地约简。通过约简,使计划者在计划工作中要处理的信息不至于超出其有限的理性范围。计划约简的第一步就是将整个国民经济约简为受计划控制的和不受计划控制的“两部门”。为了使分析更加明了,我们在此利用一个生产计划的投入产出矩阵帮助说明^④。该矩阵的每一格代表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流转产出的数量,如果一个经济包含 m 个企业和 n 种产品,那么该矩阵就包含各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 m^2 个 n 维向量,它们构成了需要由中央计划当局全面做出的计划指标数,每个企业所在矩阵中的行与列表明中央计划当局向该

① [美]埃·纽伯格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92~193 页。

② [美]埃·纽伯格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92~193 页。

③ 此数据出自 T.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06~207。

④ 这里及后面使用的矩阵参考了有关投入产出经济学的著作及 T. Lyons 的上述著作。

企业发出的全部指令或指标数。限于篇幅,我们暂且假定该经济共有 6 个企业,4 种产品。令 x_{ij}^k 代表企业 i 向企业 j 提供的 k 产品的数量,当然 $k=1,2,3,4; i=j=1,2,3,4,5,6; x_{ij}^k \geq 0$ 。这样一来,整个经济的计划问题就可以写成下列矩阵: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X_{13} & X_{14} & X_{15} & X_{16} \\ X_{21} & X_{22} & X_{23} & X_{24} & X_{25} & X_{26} \\ X_{31} & X_{32} & X_{33} & X_{34} & X_{35} & X_{36} \\ X_{41} & X_{42} & X_{43} & X_{44} & X_{45} & X_{46} \\ X_{51} & X_{52} & X_{53} & X_{54} & X_{55} & X_{56} \\ X_{61} & X_{62} & X_{63} & X_{64} & X_{65} & X_{66} \end{bmatrix}$$

上列矩阵中,每个企业受到的计划控制可由它所在的行与列来决定。例如,企业 1 所在的第一行代表了向其他 5 个企业的产出流入(即调拨)指令及其数目,第一列代表其他 5 个企业向企业 1 的产出流入(即配给)指令及其数目,如此类推。

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计划控制的范围约简到比如 3 个企业,而把其余 3 个企业列入计划控制之外,那么这 3 个企业的生产对于计划当局来讲就仅代表与受计划控制部门的“出口”或“进口”。如果我们将不受计划控制的部门用 E 来表示,那么一个将上述经济计划约简为受计划控制和不受计划控制的二部门模型就可以写成: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X_{13} & X_{1E} \\ X_{21} & X_{22} & X_{23} & X_{2E} \\ X_{31} & X_{32} & X_{33} & X_{3E} \\ \hline X_{E1} & X_{E2} & X_{E3} & \end{bmatrix}$$

其中,虚线围成的部分为计划部分,该部分之外的部门为计划外部分。现在对于计划部分来讲, X_{E1}, X_{E2} 和 X_{E3} 代表从计划外部

分“进口”向量，而 X_{1E} 、 X_{2E} 和 X_{3E} 则代表计划部分向计划外部分的“出口”向量。

以上我们对一个简化的计划经济模型的抽象分析似乎表明将经济约简成受计划控制的和不受计划控制的两个部分是任意进行的。其实不然，哪些部门受到计划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于计划的两部门约简，其基本原则是要能够减轻计划当局承担的信息负荷和工作量，能充分发挥计划者的理性从而提高计划的可行性、连续性及计划质量。这一点从上面的矩阵来看也是有所选择的。对于计划当局而言，受计划控制部分的确定必须能尽量减少计划控制部分与“外部”（即 E ）的关联，因为不然的话，受计划控制部分与计划外部门的联系越紧密，需要计划当局处理的信息量越多，计划的工作量也越大，这不符合计划约简的逻辑。同时，这样关联越多，受计划控制部分受外界干扰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又会加大计划的成本，计划的连续性也会受到干扰。另外，计划的两部门约简也必然受到中央当局偏好序的指导。也就是说，计划的两部门约简可能会受到中央政府（包括执政党）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战略考虑和指导思想上的制约。当然，以上两种因素都可能对于确定受计划控制部门的范围产生影响和作用。也许还有更多的因素可以考虑，比如所有制因素。但是严格说来，所有制因素并非决定性的，因为至少从经验来看，受计划控制部分的确定并不是严格按照公有制度或所有制结构进行的。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受计划控制的成分长期以来是一直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而不受计划控制的成分之中小型企业事业单位也在其列^①。

^① 本文在这里也可以假定所有制是计划约简的“外生变量”，国有制的范围如何决定的问题是本文关于计划约简的理论无法解释的。